

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

毕大川 刘树成 主编

科学出版社



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

毕大川 刘树成 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90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系统研究经济波动和预警监测系统的第一部专著。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学者近年来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广度和深度。

本书按其逻辑顺序分为四篇二十五章。第一篇从经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成的原因、内在机制、主要特点和有关对策;第二篇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定量分析,并研讨了相应的数学模型;第三篇从实际应用角度,探讨了建立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监测预警系统的问题;第四篇是作者对东、西方各有关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所做的研究和评价。

本书可供经济科学工作者、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经贸系、统计系师生参考。

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

毕大川 刘树成 主编

责任编辑 李淑兰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01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0年6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印数:0001—1350 字数:338 000

ISBN 7-03-001810-9/F·38

定价 9.70 元

67064/04

编 者 的 话

《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一书，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从理论到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却一直讳莫如深。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大胆闯入这一禁区，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应用上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88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研讨会”。同年8月，又由上述单位和吉林大学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信息部和经济预测部联合发起，召开了第二次“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研讨会”。这本专著综合了这两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较为系统和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学者近年来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广度与深度。这本专著属于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课题“国民经济的熵理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课题“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分析”的计划项目。

本书按其逻辑顺序分为四篇二十五章。第一篇着重从经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原因、内在机制、主要特点和有关对策；第二篇着重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定量分析，并研讨了相应的数学模型；第三篇主要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探讨了建立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监测预警系统的问题；第四篇是作者对东、西方各有关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所做的研究和评价。

本书编审组成员：

毕大川(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狄昂照(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吴明录(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吴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李富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袁放尧(中国经济出版社)。

本书各章节的撰写者：

第一章：程晓农、宋进攻。第二章：沈华嵩、李国梁。第三章：吴仁洪。第四章：程晓农、宋进攻。第五章：杜辉。第六章：黄运成、宋进攻、程晓农、孙安琴、薛玉炜。第七章：程晓农、宋进攻。第八章第一节：韩健；第二节：吴雪海；第三节：王立健、叶涛。第九章：吴明录。第十章：贾凤和、彭亚君。第十一章：罗明。第十二章：嵇耀明。第十三章：姜忠孝。第十四章：陈永昌。第十五章第一节：黄运成、宋进攻、程晓农、孙安琴、薛玉炜、陈永昌；第二节：黄运成、宋进攻、程晓农、孙安琴、薛玉炜、董文泉、郭庭选、高铁梅；第三

节：黄运成、宋进攻、程晓农、孙安琴、薛玉炜；第四节：董文泉、郭庭选、高铁梅。第十六章：高铁梅、董文泉。第十七章：邹伟东。第十八章：姚国权、董文泉、郭庭选、张桂莲、刘维用。第十九章：郭庭选、张桂莲、刘维用、董文泉。第二十章：高铁梅、姚国权、陈磊。第二十一章：韩松。第二十二章：杜辉。第二十三章：林颖。第二十四章：陈永昌。第二十五章：董文泉。

编 者

目 录

编者的话

第一篇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

第一章 加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研究·····	2
第一节 加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2
第二节 经济周期波动的若干基本概念·····	4
第三节 我国经济周期的生成背景·····	7
第二章 经济周期波动是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	11
第一节 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普遍性·····	11
第二节 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运动的时间有序形式·····	12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不平衡运动·····	13
第三章 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20
第一节 1953—1981年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20
第二节 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23
第三节 关于政策选择·····	25
第四章 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	28
第一节 经济周期成因与政策功能·····	28
第二节 短周期的经济政策·····	32
第三节 经济周期中的改革部署·····	34
第五章 双重体制下反周期的两难困境·····	36
第一节 双胀高压与结构失衡·····	36
第二节 两难困境·····	39
第三节 出路何在·····	42
第六章 我国工业的周期波动·····	44
第一节 工业经济周期及其一般特征·····	44
第二节 我国工业经济周期及其基本特征·····	46
第七章 我国农业的周期波动·····	51
第一节 农业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前提·····	51
第二节 我国农业周期波动的主要特征·····	52
第三节 农业周期波动的放大与平抑·····	55
第八章 财政收支、货币政策、军费开支与经济波动·····	58
第一节 财政收支与经济波动·····	58
第二节 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61
第三节 军费开支与经济波动·····	65

第二篇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数量分析与模型

第九章 我国经济波动的数量分析与门限模型	72
第一节 经济波动的主成分分析	72
第二节 经济波动的频率域分析	76
第三节 经济波动协调行为的区间分析	80
第四节 门限模型	84
第十章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经济周期模型	87
第一节 依据再生产理论构造经济增长模型	87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	93
第三节 以速度与结构为判据的经济周期模型	95
第十一章 频谱分解方法及其在经济周期分析中的应用	100
第一节 频谱分析方法	100
第二节 频谱分解方法的应用	102
第十二章 周期图函数分析模型	108
第一节 趋势分析	108
第二节 周期性分析	110
第三节 平稳时间序列分析	113
第四节 新增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周期波动分析	116
第十三章 经济波动的灰色系统模拟	119
第一节 生产能力利用的周期波动	119
第二节 需求变动与经济波动	123

第三篇 我国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

第十四章 建立我国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	128
第一节 建立我国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的必要性	128
第二节 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的监测对象	131
第十五章 景气指数系统	132
第一节 基准循环的确定与构成指标的选取	132
第二节 先行指标、同步指标与滞后指标	133
第三节 扩散指数	138
第四节 合成指数	145
第十六章 预警信号系统	147
第一节 预警信号系统的设计方法	147
第二节 预警界限的具体确定	149
第三节 预警信号的分析	151
第十七章 周期波动的测定方法	153
第一节 直接法	153
第二节 剩余法	157
第十八章 季节调整方法	163
第一节 三种季节调整方法	163

第二节	三种季节调整方法的比较	164
第三节	年度与月度数据的比较	171
第十九章	先行、同步、滞后指标的选取方法	177
第一节	K-L 信息量	177
第二节	聚类分析法和循环方式匹配法	182
第二十章	宏观经济监测预警计算机软件系统	185
第一节	软件系统的功能和 workflows	186
第二节	各子系统的功能	187

第四篇 对国外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与评价

第二十一章	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波动	196
第一节	苏联等四国经济波动的测量	196
第二节	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机制与波动原因	199
第二十二章	东欧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	202
第一节	概述	202
第二节	纯循环	203
第三节	短缺均衡波动	205
第四节	滞胀螺旋	206
第五节	超振危机	207
第二十三章	希克斯经济周期理论及模型	209
第一节	希克斯的乘数-加速模型	209
第二节	离开均衡状态的运动过程	211
第二十四章	西方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的历史考察	218
第一节	早期发展	218
第二节	再度兴起	220
第三节	迅速发展和成熟	221
第四节	走向国际化	224
第二十五章	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七国和地区的经济波动研究	225
第一节	概述	225
第二节	指标的选取	226
第三节	经济波动的国际扩散	229

第 一 篇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

第一章 加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研究

第一节 加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一、现实研究的呼唤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经济增长方面的多次始料不及的变化,曾一再提醒人们应进行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1961年,刘国光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分析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次率先尝试¹⁾。但是直到1984年,这一研究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1982年,国民经济实际增长超出计划速度1倍多,引起了“计划低、实绩高”原因的讨论。然而当时的分析只停留在经济活力增强、计划编制求稳等表象层次,没有考虑经济波动中的扩张可能性。正是在这一年,轻工业生产突然逐月下降,并在10月成为负增长,而且工商库存迅速膨胀,居民储蓄额急剧增长。为什么整个经济进入扩张时期轻工业反而转为收缩呢?当时的种种经验分析并未讲清这个问题。同样,对于1985年经济膨胀的背景和景气转折的判断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在原则上都接受经济发展呈波浪式运动的说法,但过去并未运用这一思想进行经济分析和理论构思。

近四年来,现实的经济波动促使人们在理论研究上进行了大胆突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一系列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广泛地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现象,它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苏联、东欧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性波动,在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出现。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都普遍地存在着。承认这个超越体制模式和发展阶段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不同体制和发展阶段中经济波动的过程特征与生成机理上的显著差别,但却对我们的经济分析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传统的经济形势分析,习惯于根据历史平均增长速度推断和评价即期与下期的经济增长。这种方法暗含一个假定,即经济增长稳定地遵循指数型增长的轨迹²⁾。近几年在经济形势分析中歧见颇多,这与是否沿用这种非周期观的分析方法有一定关系。即使是在考虑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分析者中,对经济波动的理解和判断也有相当大的差别。经济波动理论的不足对现实研究的制约已日益突出,经济政策的选择也越来越倚重于经济波动理论的发展。

1) 刘国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

2) 指数型增长指变量的增长率不变,变量值是时间的函数,它保持边际增量加速递增的规律。

二、经济波动理论的发展是动态经济学的完善

经济波动理论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位置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只研究总量关系,不包括制度研究,大多数专著中也不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研究。经济波动理论被视为总量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就不能囿于此限,必须同时包括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总量关系三大方面。这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¹⁾。经济波动理论也同样与这三个方面有关,它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和分析方法。现实经济系统是一个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复杂时变系统,而人类思维以往比较擅长的却是把握静态的空间系统,对时变系统的演变往往只是作出概略的估计。东西方经典经济学侧重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的原因可能也在于此。然而,现实研究的要求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提出了动态研究的任务。动态经济理论与静态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并无不同,但是研究方法却不一样。经济波动理论就是动态经济理论的一个部分。

动态研究是对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的特征、变化过程、前后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这种研究反映了静态或比较静态的研究所难以把握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无论是对于总量关系、经济结构,还是经济体制,运用动态方法进行研究都是极其必要的。动态变动有趋势性变动和波动两类。体制与结构的变动中研究价值更大的是前一类,总量关系中两类变动的研究则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波动理论可以主要着眼于总量关系的波动,但必须依托于体制与结构研究。动态经济理论以及经济波动理论,在与静态经济理论并行发展中,完全可能形成经济学体系里一个新的支柱。

事实上,西方宏观经济学早已开始突破静态或比较静态的分析框架,强调动态经济学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学术发展上的雄心只是局部地变成了现实,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瑞典学派提出了期间分析法,把希克斯模型称为“近年来出现的第一个有条理的周期理论”。然而杜森贝认为,“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原理的基本概念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真正地期望机械地应用这个概念去解释所观察的周期。”²⁾ 1973年,罗伊·哈罗德指出:“动态经济理论还粗糙,……一直讲授到今天的理论经济学的主体部分,包括凯恩斯派学说在内,依然几乎全都是静态的。”³⁾ 此言虽不免苛刻,但现在看来大体上还是对的。至于西方主流学派理论中的非制度性分析倾向对动态理论的束缚,以及沿用描述系统行为的解析模型受到数学求解上的限制等问题,现在仍待解决⁴⁾。

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理论的动态分析基础也是相当弱的。我们熟悉的综合平衡理论所使用的是一个典型的静态平衡观,它充分考虑了不同时期宏观状态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不平衡到平衡(或者相反)的时间过程。东欧的“制度-行为”学派提出了初步的投资周期理论及模型,可是,这一理论并未充分考虑制度的变动,在改革中国家的适用性也要具体研究。

- 1) 这样理解宏观经济理论是从研究国民经济问题的对象的特殊性出发的。在现实分析中,宏观研究还需要结合运用微观理论。
- 2) J. S. 杜森贝,希克斯论经济周期,经济学季刊,1950年8月。
- 3) R. H. 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
- 4) 经济系统的许多动态行为只能用非线性模型表示,此类复杂模型往往得不出解析解。

迄今为止,动态经济理论的发展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又反映出完善这一理论的艰巨性。这一研究不仅要求我们把理论经济学、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更紧密地结合运用,而且很可能需要我们吸收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系统动力学等新兴学说的思想和方法。

三、中国经济波动理论的生长点

在经济波动的研究中往往会出现理论构造与实证分析脱节的现象。一方面,定量分析专家发现经济波动的数量特征与规律,只是用特定原因分别解释每次循环,然后再根据数量规律预测波动走向。它因理论不足而受到批评。另一方面,理论研究者提出的假说常常不能具体解释现实,因为许多重要因素被舍弃了。这类情况在国外文献中屡见不鲜。

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波动理论的成长应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我们认为,理论的完善应当表现为它与现实之间有良好的双向对应性,既从实证中归纳,只能有效地解释、把握现实。经济波动理论的产生也遵循这一规律。因而,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工作将处于这样一个周期中:方法研究→波动描述→波动解释→理论构造→现实监测→修改方法、修正对波动的解释及理论,……经济周期的研究需要周而复始、逐步升华的“研究周期”,经济波动理论的生长点就在这样的“研究周期”当中。

第二节 经济周期波动的若干基本概念

经济波动的全面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一些基本的规范、概念尚不很清晰。这里我们仅提出一些看法,借此说明我们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理解。

一、长期趋势与波动

经济变量的变动可以分为长期趋势与波动两种。波动又可分为季节波动、循环波动、随机波动,这在统计学上早已被公认。但是,如何赋予这些以统计规律为基础的统计概念以经济学含义呢?

在长期趋势、循环波动、季节变动、随机波动四个概念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前两个。经济波动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循环波动。季节变动的原因和规律是比较清晰的。引起随机波动的大量随机性因素不能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大部分经济变量在运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增长趋势,在实际增长中又出现周期性波动。增长趋势与周期性波动始终紧密伴随、互相依存。决定经济发展的要素存量、要素组合、要素质量、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需求结构等,都有自己的一定方向的变动趋势,它们的趋势性变动决定了宏观经济变量的基本轨迹(即统计上按时间序列拟合所得到的长期趋势),构成了经济波动的基础。分析经济波动必须研究这些趋势性变动的规律,但这些趋势性变动并不是经济波动本身。在具体时点上,上述因素并非遵循绝对固定的变动速率,它们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变化的大小高低,机理要复杂得多。因此,一个变量在特定时点上的实际变化,多数情况下会偏离其长期趋势。所谓周期性波动,就是指变量

实际变化与其长期趋势间的周期性偏差是变量围绕其趋势线(基本轨迹)所发生的有规则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变量特定时点上的实际增长并不一定与其增长趋势吻合,它的波动幅度也不一定等于其实际增长率的变动。

区分趋势与波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观察问题时应有的长短相对不同的时间尺度,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形成机理不同。决定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既定的基本增长情况下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然而,在理论上分别对待两者比在统计上分解两者要难得多,把两者同时合并研究就更难。两者之间有相互依存性,波动会受到增长的影响,增长又反过来受到波动的影响。西方的理论目前也未解决好这个问题,乘数-加速数理论只是集中研究了波动,而哈罗德-多马、新古典学派、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又舍弃了波动。如何构造一种既能分别解释增长趋势与周期性波动,又能同时把握实际增长中趋势与周期相互关系的理论,是动态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二、循环、周期与波动

这三个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研究中随时使用的概念,词义本来存在差别,不加以澄清就交叉混用容易引起研究者和阅读者的误解。

在科技领域中,对周期现象的理解包含两个特征,即等间隔性与重复性。而任何经济周期都不是机械的、完全规则的形态,我们可以在平均的、概率的意义上发现周期长度,但经济周期的定义中显然不包含等间隔性这点。经济周期是指经济现象或变量在连续过程中重复出现涨落的情况,所强调的只是再现性、重复性。如此理解,经济中的周期与循环就是同义语了。

经济波动可以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波动包括周期性波动(循环波动)、季节波动与随机波动。实证研究中所分析的必然是广义波动。而理论研究上似应以周期性波动(狭义的经济波动)为主要对象。因此,经济波动理论中狭义的波动与周期、循环含义一致,采用这样的定义三者就可混用。

三、长波、中波与短波

在西方文献中,把经济周期按周期长度区分为四类,即基钦周期(40个月)、尤格拉周期(9—10年)、库兹涅茨周期(15—22年)、康德拉捷耶夫周期(50—60年)。熊彼特曾研究过四类周期的数量关系。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周期的时间长度分类,很难照搬这套分类法。因为,中国周期的长度特征并不一定符合西方的规律,同时上述四种周期都已被赋予特定的生成机理,与中国的情况也未必相同。例如,中国研究者发现的投资-工业周期、农业周期(5—6年)就很难归入上述分类。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把中国的周期分为长波、中波、短波三类,分别表示周期长度为几十年、5—10年、2—3年的周期,在相当一个阶段里研究重点可能还只是中波与短波。

区别长、中、短波的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三种周期理论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导致周期发生的诸多因素有的变动迅速,有的变动缓慢;有的只有短期作用,有的却有长期作用。因而,不同的因素影响周期的时间效应差别甚大,在解释三种周期时应充分考虑。

通常,文化、教育、生态环境、重大技术革命的推广普及都是缓慢变动、影响力久远的因素。但在中、短波分析中,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在时序上差异微弱,可被看作相对稳定的基本背景。而经济体制、基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人口及劳动力等因素比教育、文化等因素变化要快得多,但在两三年内它们的变动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因此,研究经济波动有必要区分长程、短程分析和长效(长时间效应)、短效影响因素。所谓长、短程是个不同时间尺度间的相对概念,相对于长波分析,中波分析是短程分析;而相对于短波分析,中波分析就是长程分析了。长、短效因素的区分亦是如此。应当重视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用长效因素的变化去解释短程分析中的波动,例如,不能用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变化解释中波,用体制、结构的渐进演变解释短波;另一方面,在短程分析中可以视长效因素及其作用力相对稳定,处于相对稳态的长效因素仍然可能影响短程波动,例如,体制、结构在短波分析中是相对稳定的,但短期的供求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既定体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及基本经济结构决定的。我们要重视各种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但这并不等于不考虑不同因素的时效特性,不加区别地用任何因素的变化去解释各种波动,长、中、短波的分析方法应当有所区别。在中波分析中把文化的影响视为既定因素,在短波分析中视体制为既定状态,丝毫也不意味着排除了这些因素作用力的分析。

在区别长、中、短波分析的同时,还要注意长、中、短波之间的特定的相对转换关系。我们在定量分析中可以发现,一定时期内,短波分析中的趋势受中波影响,中波分析中的趋势受长波影响。某个变量的长程分析中所揭示出的波动,可能转化为短程分析中的趋势。趋势与波动的相互依存性,不仅存在于同一时间尺度的动态分析中,而且在不同时间尺度的动态分析中也同样存在。这种转换关系也说明,由于长、短程影响因素有时效差异,长程因素的缓慢渐变与持久影响力,在短程分析中会表现出作用的相对稳定性。

四、周期的阶段划分

深入的经济周期实证研究,离不开对变量周期性波动特征的具体刻画。常用的经济周期特征参数,如周期长度、峰谷落差等首先取决于对每个具体周期的界定。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它表现为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通常,我们把经济变量由一个谷底到下一个谷底,经历一次扩张和收缩的过程视为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内不同阶段的区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而如何理解扩张与收缩,对怎样区分周期的各个阶段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种直观的理解是,扩张与收缩是经济变量绝对水平升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只是特例。扩张和收缩是个相对概念,扩张是相对于收缩而言的,收缩也是相对于扩张而言的。如果承认经济变量在发生波动的同时还存在着趋势性变动,那么当变量的变动由谷底接近趋势变动线时,是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趋势线到达峰顶的过程,是周期的扩张阶段;再由峰顶回归趋势线的过程,是周期的收缩阶段;由趋势线转落谷底的过程,是周期的萧条阶段。这样,在上次周期的萧条阶段与本次周期的复苏阶段之间有一个复苏转折点(谷底);在复苏与扩张阶段之间有个扩张转折点;扩张与收缩阶段之间有个收缩转折点(峰顶);在收缩与萧条阶段之间有个萧条转折点。周期的复苏、扩张、收缩、萧

条四阶段是以确认上述四个转折点为前提的。扩张与收缩阶段组成高涨期，而把高涨期区分为两个阶段正好反映出变量的动态走向，是进入高涨还是走出高涨；萧条和复苏阶段组成低落期，分别反映变量是走向谷底还是走出谷底。如果在分析周期时只观察波动不分析趋势变动，就无从确定扩张和萧条转折点，从而当变量的运动处于峰谷之间时，也无法区分高涨期和低落期。而在宏观决策中，判定高涨、低落期是政策选择上不可缺的依据。通常，人们比较容易发现峰、谷，但宏观调控却不能简单地仅根据有关峰、谷的信息决策，在动态经济过程中，经济活动只是在短时间内处于峰、谷状态，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由一个转折点向另一个转折点变动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周期的不同阶段选择恰当的政策。

当变量处于低落期时，其绝对水平是否下降是由变量的趋势变动和波动幅度共同决定的。只有当趋势变动平缓、而波动幅度又充分大时，变量的绝对水平才可能在萧条、复苏阶段下降。否则，低落期时变量绝对水平仍然上升，只是增长率下降。西方把古典周期的定义加以修改提出增长周期，正是因为增长趋势加快、波动幅度减小所致。我国50年代波动幅度偏大，1985年后工业增长趋势加快、农业增长趋势转缓，对周期特征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逻辑上讲，趋势变动与波动幅度间的相对关系有各种可能，低落期变量绝对水平下降只是一种可能，可被看作是特例，现实中亦是如此。

周期的阶段划分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中都存在经济周期，但特征、机理、性质并不相同。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资本主义式经济危机，就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现实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中，峰、谷时期的经济状态都可能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困难。例如，伴随着经济过热可能出现严重短缺和通货膨胀；当经济被迫强烈收缩时，可能出现企业大范围亏损、高额财政赤字、甚至被迫压缩就业，但在具体的周期中每次情况和程度却都不同。通常遇到的一般程度的社会经济困难经过调整即会渡过，而且由于各经济子系统周期不同步，局部出现的某些问题并不一定引起全局性的困难，亦比较容易解决。但是，还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政策有较大失误，或经济中几个主要方面同时出现周期性困难（如农业生产低谷、国际收支逆差、需求高峰、财政赤字加大等同时到来），引起较严重的社会经济困难，这种情况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根本不同，但也要付出相当代价才能解决。从解决难度的角度看，这种偶然出现的情况也可被视为宏观调控中的暂时性“危机”，周期性对策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出现这样的“危机”，保证经济在正常波动中稳定发展。

周期的四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每个阶段的出现同时意味着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的可能。复苏是周期的起点，扩张是复苏的延伸和扩展，收缩是扩张的必然结果，萧条则意味着本次周期接近终结。由于各种经济活动的运动机制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同变量的周期变动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传递性，而且由于传递过程中的时差，不同变量在周期变动中可以区别为先行类变量、同步类变量、滞后类变量。周期的阶段划分是区别变量周期变动时差特性的必要手段，变量周期变动的时差分类是准确判断宏观经济状态的重要分析工具。

第三节 我国经济周期的生成背景

经济周期理论构造要走从实证到理论的研究道路，就需要对周期的生成背景有准确

的把握和深入的剖析。这样一个背景决定了国外经济周期理论的可借鉴程度,决定了中国经济周期理论构造的认识基础。如果从周期的具体生成背景中超脱出去,那就只能构思出“空中楼阁”式的理论。

一、制度环境变迁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认为,经济体制包括三组互为补充的社会关系: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动力结构。中国改革前后这三种结构的变化非常明显。首先,全面、高度集中统一的决策结构开始向多层次、多元化的决策结构转变,不仅在生产、分配、流通领域中如此,在消费领域中消费者的自立决策地位也大大提高。其次,按行政组织层次垂直接流动为主的决策信息向垂直与横向流动相结合的状况过渡,生产者的决策信息已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单纯依赖上级。再次,由于改变了激励机制,承认了经济活动主体的相对独立利益,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利益动机明显强化、对近期利益的追求日益强烈。虽然改革仍处于过渡期,传统体制仍占据着相当地位,但与改革前比,市场机制的范围已大大扩展。

市场机制的扩展可从三个方面观察:第一,指令性计划比重持续下降;第二,市场需求的决定作用已经增强,生产者对市场需求的反应灵敏程度提高;第三,与传统体制关联较弱的非国营部门(包括农村经济和城市非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体制的变化、市场机制的扩展必然反映到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变化上。不仅非国营部门的经济行为与国营部门不同,而且改革前后国营部门的行为也有相当的区别。经济周期机理与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紧密关联。只有对不同经济活动主体的具体行为作分类实证分析,才能有效地解释周期机理。以科尔内为代表的东欧理论适用于改革前的制度条件,但用这种理论解释改革中非国营部门的体制、行为就不很有效,甚至改革中国营部门的行为与东欧理论也有相当差距。另外,西方的乘数-加速原理所依托的制度、行为条件在我们的国营部门中也未必存在。

在我国的双重体制下,首先,国营与非国营部门的体制、行为不同,因而两个部门经济波动机理也不一样,不能简单地试图用只适应其中一个部门的理论解释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双重体制中行为的多元化,要求建立复合结构的周期理论;其次,要针对国营部门改革前后的行为差异构造不同的周期假说,应当避免研究中的一种悖论,即一方面强调体制及体制改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单纯套用短缺经济理论,忽视改革中制度、行为的变化,使研究模式固定化。

二、发展阶段演变

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对供求关系、增长趋势和周期机理都有深刻的影响。研究周期理论要充分关注发展阶段演变的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

1. 增长格局演变

农业由改革前的低度增长转变为 80 年代前半期的超常规增长,曾极大地影响着宏观

经济状态；最近又由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这必然使农业及其它周期的特征发生变化。农村工业化不断加快，也使农村经济波动对国营及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迅速增强。同时，加工工业及部分原材料部门进口替代的逐渐扩大，对经济增长潜能正在发挥深远的影响。

2. 经济的国际关联程度转变

近几年来，外贸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关联程度已超过美、苏、日。一方面，外贸总量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只根据国内供求把握周期成因已有局限性；另一方面，外贸对供给“瓶颈”的制约也大大增强。过去相对封闭的经济中，供给“瓶颈”只能靠国内产业结构的缓慢转变进行调整，现在则可以通过进口结构调整，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可进口资源的供给“瓶颈”状况。当然，出口结构的变动也同样可能加剧“瓶颈”部门的短缺，这种情况下的周期机理必然会发生变化。

3. 产业结构发展阶段演变

建国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经历了1978年以前的初步工业化阶段和1978年以后的主层次均衡化阶段。产业结构失衡已不再表现为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主要矛盾变成了工业部门结构后倾化和技术结构发展迟缓。相应地，供求结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现象与过去有所不同了，以往生产能力的过剩主要是相对于“瓶颈”部门而言的，现在则有一批行业的生产能力相对于市场需求也出现过剩。加工组装行业内转产、开拓的空间缩小，过度扩张行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现在，一般性地讨论供求结构矛盾、而不具体分析其阶段特征，就不容易解释近几年中国经济对紧缩的承受力下降等周期机理问题。

三、宏观平衡关系转变

周期理论与宏观平衡问题直接关联。通过对1978年以来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后收入流程的变化，国民经济信用化程度提高，整个经济由财政主导型向信贷主导型转变，相应地一系列宏观经济关系也出现重要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由经济景气的支配者变为景气的接受者，经济膨胀时财政赤字缩小，经济紧缩时赤字迅速扩大，以财政赤字判断景气状态时结论与过去相反。所以，周期理论也要相应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选择也要重新认识。过去强调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等几个主要方面的同时平衡，现在这样的平衡条件已不存在，我们不得不在财政平衡、货币投放、物价稳定等目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而这样的综合权衡的动态原理更为复杂，它还是研究中的处女地。东欧“制度-行为”学派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极为有限，中国的经济周期理论应当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

四、双轨体制中特殊的货币、价格问题

改革中特殊的双轨体制决定了经济周期机理和宏观调控方式的特殊性，在货币决定